

# 文化的误读与讹传<sup>①</sup>

## ——以“荸荠化铜”为例

周 燕,周 军

(西藏大学 历史系,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荸荠是一种常见的水果、蔬菜,然而在一些古老的医方记载中,荸荠竟然具有“化铜”的神奇功效。此种功效被明末清初来华的一些传教士介绍到西方,并大加渲染,激发了许多欧洲人的好奇,以致成为法国“国王数学家们”来华后首先求证的一件事情。从不同传教士对待“荸荠化铜”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异质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的误读与讹传除了知识所限,更多的则是态度使然。

**关键词:**荸荠;传教士;文化误读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6-0060-04

# Misunderstanding and False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

## ——“Bi Qi can Melt the Copper” for Example

ZHOU Yan,ZHOU Jun

(Department of History Tibet University, L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Bi Qi, a common fruit or vegetable, was recorded to be a magical thing which can “melt the copper” in some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It was introduced 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by Jesuit missionaries. This aroused the curiosities of western people and even was the first mystery to be uncovered when they came to China. From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Bi Qi can melt the copper”, we can see that misunderstanding and false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 is more caused by attitude than knowledge.

**Key words:** Bi Qi; missionary; mis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辉煌的时期,中西双方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耶稣会传教士是成就这一辉煌的桥梁。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Dr. Joseph Needham)所言:“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史中,似乎没有什么可与耶稣会士 17 世纪来到中国这件事相比的了。”<sup>[1]</sup>耶稣会士为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但是,在异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难免误读和曲解,也会造成一些讹传,“荸荠化

铜”就是其中一例。

荸荠,俗名地栗、马蹄、乌芋、红慈姑,一种常年水生植物的块茎,盛产于我国江苏、安徽、浙江等地。荸荠性寒、味甘、多汁,有清热、明目、利咽、化痰、开胃、消食、益气等功效,是人们十分喜欢的一种水果、蔬菜。但是,让不少欧洲人对荸荠感兴趣的不是它的这些功效,而是它的另一种神奇功效:

① 收稿日期:2010-06-03

**作者简介:**周 燕(1974-),女,四川成都人,西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藏族历史研究;  
周 军(1976-),男,四川成都人,西藏大学师范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应用化学研究。

化铜。

最早将“荸荠化铜”之说介绍到欧洲的是明末清初在华的著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在他的著作《中国概览》(Description de la Chine)中首先向欧洲人介绍了荸荠化铜的威力:“这个地方的沼泽和泥塘生长着一种圆形水果,中国人叫做荸荠。它与板栗差不多大小,果肉外覆盖一层薄薄的栗色果皮。果肉非常白,汁很丰富,味道很好。他比普通苹果的酸性更强烈,更持久;如果你把铜钱与这种水果放到嘴里,你用牙齿将它们咬碎,使得铜与荸荠容易混合,铜就容易因为腐蚀而减少。这种天然的能力令人赞叹。我在这里进行了多次实验。”<sup>[2]</sup>

卫匡国的这一记述又被其他人转述。如1675年3月来华的沙皇使节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Nicolae Spataru Milescu)在中国呆了5个月,回国后写了一部游记《中国漫记》(Descrierea Chinei)。他在书中毫无怀疑地引用了卫氏关于荸荠的记载,并且更加夸张:“这里的池沼广泛生长一种水果,中国人叫荸荠,圆形,大小如栗子,薄薄的一层红皮,肉白色,味道如苹果,但略酸。这种水果有这样的威力,如果放一颗荸荠在铜或其他金属壶嘴上,并塞紧,这个金属壶会立刻变软。”<sup>[3]</sup>

经过卫匡国、米列斯库等人的渲染,欧洲竟然出现如果荸荠和铜掺和在一起,“能使铜成为‘可以食用’的物质”的说法。<sup>[4]106</sup>

17世纪的欧洲是笛卡尔怀疑主义和培根实验主义盛行的时代,因此也有人怀疑荸荠化铜的说法,但由于欧洲并无荸荠可以做实验,只得将信将疑。1685年3月,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了六位耶稣会士,其中五位到达中国,即洪若翰(Fontaney)、白晋(Bouvet)、张诚(Gerbillon)、刘应(Visdelou)和李明(Louis Le Comte)。这些耶稣会士与其他来华传教士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其他传教士几乎都是由教廷或修会派遣而来,是单纯的宗教人士,而他们虽然是耶稣会士,却并非是受耶稣会派遣来华,而是由法国国王以“国王数学家”身份来华,他们来华的资金也全部由路易十四提供,在“民权方面仅服从国王”。<sup>[5]</sup>而且,其他来华的传教士任务单一,就是来传播上帝福音,而“国王数学家”们除了传播福音,还肩负着明确的科学任务。正如法国财政总监柯尔伯(Colbert)曾经对传教团团长洪若翰所言:

“我的神父,科学不足以驱使你们渡重洋,离祖国,别亲友,而徙居别一世界。然而,劝化异教徒改宗以及把他们的灵魂争取到耶稣基督这方面来,常使你们的神父做此远行。我希望,诸神父们利用这一机会,在传播福音之暇在当地进行种种观察,使我们能够完善多种科学与艺术。”<sup>[6]</sup>

“国王数学家”们是带着明确的科学任务来到中国,因而对中国各种事物的观察不像其他传教士那样是随意或兴趣使然。他们早在欧洲就知道“荸荠化铜”的说法,并对此说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所以,当1687年7月“国王数学家”们来到浙江,也就是卫匡国谈荸荠能够化铜的那个地方,就迫不及待地对这则记载进行验证:“我们取中国的双份铸铜,极易酸腐又极脆的铜和一块荸荠,我们当中牙齿最利的一位把铜咬碎成几块;其他人担心会不舒服,不肯用力,未能达到目的。咬断的铜的碎块其实还很坚硬,这使我们认为荸荠的作用只在于,当它包裹着铜的时候,保护牙齿,并使牙齿更为有力,以便折断铜却不会感到牙齿不适。一点点皮革也能起到与荸荠同样的作用。为了验证我们的看法,我们使用了经过锻打的铜,无论牙齿还是荸荠都没能在上面留下任何痕迹。在嘉兴城,我们多次重复同一实验,但总是取得同样的结果。”<sup>[4]106-107</sup>

那么,卫匡国关于荸荠化铜的记载是他的杜撰吗?对于卫匡国这样一位博学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讲,这似乎不太可能。那么,荸荠化铜到底是怎么回事?

## 二

毫无疑问,卫匡国关于荸荠化铜的知识来源于中国人,因为在中国人的著作中确实很多关于荸荠化铜这一神奇功效的记载。在一些医书中,关于“荸荠化铜”的记载就多次出现:

(元)危亦林撰《世医得效方》载:“误吞铜物不能化者,浓煎缩砂汤服,其铜自下;又用生荸荠研烂服,其铜自化。”<sup>[7]</sup>(明)周定王朱棣编撰《普济方》有两则关于荸荠化铜的记载:“误吞铜物不能化者,用浓煎缩砂汤服,其铜自下;又用生荸荠研烂服,其铜自化。”“误吞钱,用生鳊茈取汁呷吃,钱自然消化。即荸荠也。”<sup>[8]</sup>(明)汪机撰《外科理例》载:“误吞铜钱,用炭末白汤调服,多食蜜、食饴糖,自从大便出;或多食荸荠或胡桃肉,钱自消。”<sup>[9]</sup>(明)王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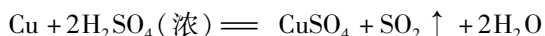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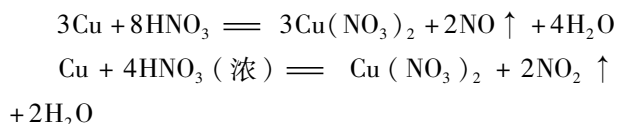
堂撰《证治准绳》载:“吞钱,烧炭末,白汤调服,数匙即出;或服蜜,升许;或食荸荠、茨菇,其钱自化。”<sup>[10]518</sup>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朱棣编撰的《普济方》中关于荸荠化铜的记载来自危亦林撰《世医得效方》;而汪机所著的《外科理例》关于荸荠的记载和王肯堂撰的《证治准绳》似乎也是同一来源。

“荸荠化铜”的功效甚至被用于民间巫术,“向见一女巫,应有祈祷,必纳香钱,使自投于干净盂中,随即不见,人多神之。后得其术,乃用荸荠、水银、杂草叶数种埋之地中,七七药成,每密投少许于水中,钱入即化。挟邪术,托鬼神以欺世如此类者甚多,不欲尽纪,姑叙数端以祛后来者之感。”<sup>[11]</sup>此说法被(元)陶宗儀撰《說郛》照录。<sup>[12]</sup>

所以,卫匡国对“荸荠化铜”的记载并非子虚乌有,而是从中国人的典籍中看到或者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而且在清朝康乾时期,关于“荸荠化铜”的记载也不少。如康熙四十七年由汪灏等人编著《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称“荸荠煮铜则软”;<sup>[13]</sup>(清)礼部侍郎胡煦撰《周易函书别集》也称“荸荠煮铜则软,甘草煮铜则硬”;<sup>[14]</sup>乾隆时期著名的学者纪昀等编《御纂医宗金鉴》载:“误吞铜钱,虽无疼,久留腹中,病必成。荸荠能化坚为软,多食无伤,可化铜。误吞铜钱,多食荸荠即能化坚为软”;<sup>[15]</sup>而纪昀在编辑《钦定续通志》也称“荸荠,一名地栗,种浅水,七修类藁云:荸荠淹铜过夜即烂。”<sup>[16]</sup>

中国人关于“荸荠化铜”记载形象生动,卫匡国也宣称自己做过多次实验来证明“荸荠化铜”的能力,而“国王数学家”们则宣称自己在多处对“荸荠化铜”做过实验,否定了荸荠能够化铜的说法。那么,谁说了假话?是中国人?卫匡国?还是“国王数学家”们?

其实,要判断对错,首先要了解铜和荸荠的性质,因为“荸荠化铜”应该是个化学反应。铜属于不活泼金属,一般条件下不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只能与诸如强酸性物质,如浓硝酸( $\text{HNO}_3$ )、浓硫酸( $\text{H}_2\text{SO}_4$ )才能发生化学反应。(溶解铜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另外,“王水”:浓硝酸与浓盐酸的混合液,体积

比为1:3,也能溶解Cu)

而荸荠是弱酸性物质,在实验条件下,它不可能与铜发生化学反应,也就不可能“化铜”,所谓荸荠淹铜,把荸荠放到铜壶过夜就能将铜溶化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应该是讹传。

### 三

误读只是异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常态,却不是必然。大多数的文化误读是由于态度使然,而非知识所限。其实中文记载荸荠化铜的来源主要两方面:一是巫术,一是医学。即使巫术中的药水真能溶化铜钱,却并不能推断出荸荠就有化铜的功效,因为巫术中所配制化铜的“药水”除了含有荸荠外,还有其他东西,更何况巫术中本来就多幻术,不足为信。但对中医来说,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一直是世界难题,因为中国的医方有很多是经验之学而非实验科学,不具有实证性。就“荸荠化铜”而言,我们知道,固体铜本无毒,即使被人体误吞,如果量少,短期内一般不会致命;铜元素是重金属元素,有巨毒,其形成的溶液若被人吸收,则极易中毒。所以,如果铜在体内被溶解,非但无益反而有害。虽然医方的记载似乎很难经得起科学实验的推敲、检验,但是,人体自身又是个神奇的化工厂,内部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也不能轻易对这些古老的医方作出“科学”的评判。

对于学识渊博的早期来华耶稣会士而言,荸荠能否化铜其实只是个很简单的实验,要验证并非难事。尽管卫匡国称自己曾经多次做过实验,但他肯定是在说谎,其目的是激发欧洲人对“荸荠化铜”的好奇,而后来者更是人云亦云,并进一步夸大事实,最终形成“如果放一颗荸荠在铜或其他金属壶嘴上,并塞紧,这个金属壶会立刻变软”的讹传。

其实,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有很多的误读。如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介绍老子时称:“据说他出生之前的怀胎期曾长达八十年,因此叫他作老子,即老人哲学家”,<sup>[17]110</sup>他还将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理解为“洪水般的武功”;<sup>[17]45</sup>曾德昭(Semedo)则把“冷宫”认为“是寒冷之宫”;<sup>[18]</sup>而安文思(Mag·Ihaes)也把“中华”解释为“中心的花朵”。<sup>[19]</sup>无论是从中文造诣,还是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来看,这些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中的很多人都超过17世纪末来华的“国王数学家”们,但

是,这些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唯一目的是传播上帝福音,介绍中国文化仅是一个副产品,他们只是将自己感兴趣的所见所闻,甚至自己主观臆想的中国风物告诉欧洲人,至于其对错真假却很少认真深究。“国王数学家们”则是带着明确的科学观察任务来了解中国,他们不愿意早期耶稣会士那样轻信、盲从,而是尽量用实验的方法来明辨是非。从对待“葶荠化铜”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国王数学家”与早期来华传教士的区别,他们已经开始把中国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简单的描述对象,“国王数学家们”来华开启了一个科学研究中国的时代,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所言:“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实肇于十八世纪,创始者为法国的耶稣会士”。<sup>[20]</sup>

参考文献:

[1] 潘吉星. 李约瑟集[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346.

[2] Martin. Description de la Chine[M]. Paris,1672:142-143.

[3] 尼古拉·斯帕塔鲁. 中国漫记[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78.

[4] 李 明. 中国近事报道[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5] 毕诺.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1.

[6] 杜赫德. 耶稣会士书简集 I[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251.

[7] 危亦林. 世医得效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357.

[8] 朱棣编. 普济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448.

[9] 汪 机. 外科理例[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180.

[10] 王肯堂. 证治准绳: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67册)[M].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518.

[11] 储 泳. 祛疑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M].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207.

[12] 陶宗仪,陶 挺. 说郛三种:卷七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108.

[13] 汪 灏. 御定广群芳谱:卷六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6册)[M].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771.

[14] 胡 煦. 周易函书别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册)[M].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1066.

[15] 吴 谦. 御纂医宗大字金鉴[M]. 台北:文化图书公司,1976:2085.

[16] 吴 谦.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七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94册)[M].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825.

[17] 利玛窦. 利玛窦中国札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18] 曾德昭. 大中国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34.

[19] 安文思. 中国新史[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1.

[20] 中法汉学研究所. 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法国汉学[C]. 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1943:6.

责任编辑:骆晓会